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理解中国丛书  
Understanding China Series

# 破解中国经济 发展之谜

—— 蔡昉 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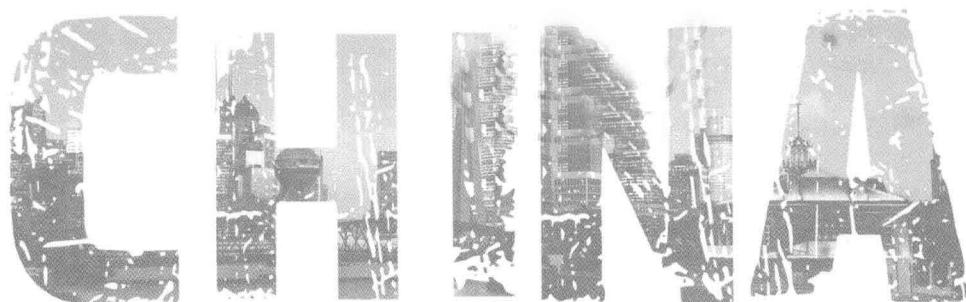


Demystifying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ransitio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破解中国经济 发展之谜

蔡昉 著



Demystifying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ransition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 蔡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 - 7 - 5161 - 3848 - 9

I. ①破… II. ①蔡…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7129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萍

特约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刘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58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11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理解中国》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王伟光

**编委会副主任：**李 捷 李扬(常务) 李培林

**编委会成员** (以拼音字母为序)：

蔡 昉	高培勇	郝时远	晋保平
金 磐	李 捷	李 林	李培林
李 扬	王伟光	王 巍	杨 义
周 弘	赵剑英	卓新平	王 镛

**项目联络：**王 英 朱华彬

## 出版前言

自鸦片战争之始的近代中国，遭受落后挨打欺凌的命运使大多数中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改变“西强我弱”和重振中华雄风需要从文化批判和文化革新开始。于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学习日本、学习欧美以至学习苏俄。我们一直处于迫切改变落后挨打、积贫积弱、急于赶超这些西方列强的紧张与焦虑之中。可以说，在一百多年来强国梦、复兴梦的追寻中，我们注重的是了解他人、学习他人，而很少甚至没有去让人家了解自身，理解自身。这种情形事实上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亦无明显变化。20世纪80、90年代大量西方著作的译介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历史。

但与此并行的一面，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强国梦、中华复兴梦的追求中，通过“物质（技术）批判”、“制度批判”、“文化批判”一直苦苦寻求着挽救亡国灭种、实现富国强民之“道”，这个“道”当然首先是一种思想，是旗帜，是灵魂。关键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旗帜、什么样的灵魂可以救国、富国、强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屈辱、失败、焦虑中不断探索、反复尝试，历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实践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道路的破产，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终于走出了中国革命胜利、民族独立解放之路，特别是将科学社会

## 2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还不完善，但可以说其体制制度基本成型。百年追梦的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姿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长期以来形成认知、学习西方的文化心理习惯使我们在中国已然崛起、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的现实状况下，还很少积极主动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自己——“历史的中国”和“当今现实的中国”。而西方人士和民族也深受中西文化交往中“西强中弱”的习惯性历史模式的影响，很少具备关于中国历史与当今发展的一般性认识，更谈不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了解，以及“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对于中国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对于人类文明的独特价值与贡献这样深层次问题的认知与理解。“自我认识展示”的缺位，也就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不同政见人士抛出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等甚嚣尘上。

可以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习西方和认识世界上，并习惯用西方的经验和话语认识自己，而忽略了“自我认知”和“让别人认识自己”。我们以更加宽容、友好的心态融入世界时，自己却没有被客观真实地理解。因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总结出来，讲好中国故事，讲述中国经验，用好国际表达，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民众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无疑是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学术文化研究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担当。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本院一流专家学者和部分院外专家编撰了《理解中国》丛书。这套丛书既有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总的梳

理和介绍，又有从政治制度、人权、法治，经济体制、财经、金融，社会治理、社会保障、人口政策，价值观、宗教信仰、民族政策，农村问题、城镇化、工业化、生态，以及古代文明、文学、艺术等方面对当今中国发展作客观的描述与阐释，使中国具象呈现。

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国内读者更加正确地理解百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更加理性地看待当前面临的难题，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和民族自信，凝聚改革发展的共识与力量，也可以增进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与理解，为中国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2014年1月9日

# 目 录

<b>第一章 三十年仁政乃成</b>	.....	(1)
1.1 人均收入的翻番	.....	(1)
1.2 世界性减贫范例	.....	(5)
1.3 中国特色“三农”政策	.....	(10)
1.4 社会保护从无到有	.....	(15)
1.5 不平衡的包容式发展	.....	(20)
<b>第二章 发展是硬道理</b>	.....	(24)
2.1 “风景这边独好”	.....	(24)
2.2 “中国崩溃论”	.....	(29)
2.3 迄今的增长源泉	.....	(31)
2.4 走向科学发展	.....	(35)
2.5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41)
<b>第三章 改革是根本动力</b>	.....	(47)
3.1 改革的逻辑	.....	(47)
3.2 激励机制与治理模式	.....	(52)
3.3 市场竞争环境	.....	(57)

## **2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3.4 发展型政府 .....	(62)
<b>第四章 全球化与中国因素 .....</b>	<b>(68)</b>
4.1 全球化的含义 .....	(68)
4.2 超越与趋同 .....	(72)
4.3 打破供给“瓶颈” .....	(74)
4.4 是“为人作嫁说”吗? .....	(79)
4.5 大国效应 .....	(83)
4.6 “雁阵”还是“巨龙” .....	(86)
<b>第五章 发展阶段与转折点 .....</b>	<b>(94)</b>
5.1 经济发展阶段 .....	(94)
5.2 中国经济转折点 .....	(98)
5.3 认识宏观经济形势 .....	(105)
5.4 “中等收入陷阱”? .....	(111)
5.5 中国式应对 .....	(114)
<b>第六章 可持续增长引擎 .....</b>	<b>(118)</b>
6.1 从供给因素着眼 .....	(118)
6.2 劳动生产率 .....	(124)
6.3 资本劳动比 .....	(129)
6.4 全要素生产率 .....	(133)
<b>第七章 延续人口红利 .....</b>	<b>(137)</b>
7.1 未来的就业挑战 .....	(137)
7.2 教育可能过度吗? .....	(146)

7.3 应对未富先老 ..... (152)

**第八章 实现包容性增长 ..... (158)**

8.1 提高劳动参与率 ..... (158)

8.2 城市化的核心 ..... (165)

8.3 农业当自立 ..... (170)

**第九章 挖掘制度红利 ..... (181)**

9.1 打破政府悖论 ..... (181)

9.2 拆除配置障碍 ..... (187)

9.3 患寡,也患不均 ..... (192)

9.4 社会保护不是负激励 ..... (201)

**第十章 拥抱伟大复兴 ..... (211)**

10.1 “李约瑟之谜” ..... (211)

10.2 两个“百年目标” ..... (219)

10.3 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 ..... (222)

10.4 现代化的含义 ..... (225)

10.5 爬坡与攻关 ..... (229)

# 第一章

## 三十年仁政乃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十一代孙、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对这句话的权威解释是：“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就是说，30年叫做一代，治理国家者施行仁政，解决民生问题，30年是一个可以初显实效的时间区段。以1978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起始，至今已经30余年，其间中国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最突出地表现为民生的普遍改善。即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整体提高的过程中，政府同时实施了大规模的农村扶贫规划，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并在推动城乡就业扩大的同时，加强了劳动力市场规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保护机制，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提供了基本安全网。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30多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包容式的。但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快慢不一，社会保护得到改善的程度也有差别，表现为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都构成不容回避的政策挑战。

### ◇ 1.1 人均收入的翻番

在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即1978—2011年期间，中国经济

增长率得以保持每年近 9.9% 的速度。不仅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增长也创造了奇迹。这期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8.8%。按照统计学的一个拇指法则，7% 的年均增长率可以实现 10 年翻一番，而 10% 的年均增长率则可以在 7 年实现翻番。如此可以想象，上述人均 GDP 增长速度在 30 余年的持续所能产生的效果。

让我们来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 1780—1838 年花了 58 年，美国在 1839—1886 年花了 47 年，日本在 1885—1919 年花了 34 年，韩国在 1966—1977 年花了 11 年。而中国在 1978—1987 年期间只用了 9 年的时间，随后又在 1987—1995 年和 1995—2004 年期间分别用 8 年和 9 年时间再次两度翻番，并于 2011 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 7 年的时间。

经济史学家发现，自 18 世纪较晚的时期开始，即大致以工业革命为界，世界经历了一个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大分流”，随后则形成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分野格局，至今未变。因此，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孜孜不倦的热情和持久动机，就是探索后进国家如何在人均收入上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落后国家能否发动起一个快于先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在较长的时间内加以保持。作为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足够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创造赶超奇迹。

中国 GDP 总量在 1990 年只排在世界第 10 位，到 1995 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 7 位，到 2000 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 6 位。随后，在 21 世纪前 10 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 2010 年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2011 年，中国的 GDP 总量为 72981.5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48.4% 和世界的 10.5%。中国在 30 余年的时间里，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这一经验充分证明，只要选对了道路，即坚持改

革开放促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赶超。

当GDP总量被创造出来之后，如何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或者经济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例如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的分配，或者在劳动者、经营者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分享水平。换句话说，要看一个经济增长奇迹是不是真正惠及民生，除了观察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更要看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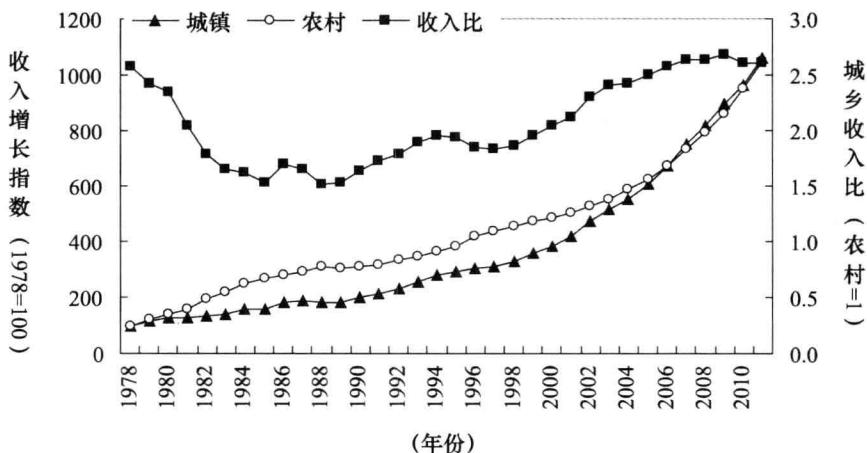


图1—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差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从图1—1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2011年的33年时间里，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都以惊人的速度提高，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年平均增长率均为7.4%。其间，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年代开始，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速度相对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而在2004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重新拾起了较高的速度，呈现逐渐快于城镇居民收入的趋势。

正如图1—1所示，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即研究者

## 4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习惯于激烈抨击的城乡收入差距，实际上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严重。通常的计算方法是，把每年的名义城乡收入，以农村居民收入作为1，来计算两者之间的比率。按照这个方法，2011年城镇居民名义收入为21810元，农村居民名义收入为6977元，城乡收入比为3.12，无疑高于1978年的2.57，比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1983年（1.82）更是高出许多。但是，由于农村与城镇的生活费用不尽一致，物价变动幅度也不同，这种忽略了价格因素，依据城乡名义收入计算收入比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按照城乡不同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我们计算出可比的历年城乡居民收入，以及城乡收入比。观察这一组城乡收入比数字，我们发现，其一，2011年的城乡收入比为2.61，仅略微高于1978年的水平；其二，这个收入差距比1988年的1.50仍然高出不少，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U字形的变化过程，即在改革之后一度显著下降，随后再次扩大；其三，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低于2007—2009年三年的水平，显示出缩小的趋势。

不仅如此，现行统计体系中的住户调查，因遗漏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图1—1中显示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包含着高估的成分。由于官方统计系统内的住户调查是分城乡独立进行的，因此，举家迁入的农村家庭和外出打工农村家庭成员，既因难以进入抽样范围而被显著排除在城市样本之外，又因长期外出不再作为农村常住人口，而被大幅度排除在农村样本住户的调查覆盖之外。

我的一些同事无疑注意到了现行城乡住户收入统计的这一缺陷，尝试从不完善的统计体系中挖掘出相关的证据，告诉我们更加接近于真相的城乡收入差距。他们选择一个发达地区省份浙江和一个西部省份陕西，通过对包括统计局记账户和抽取的其他住户进行调查，重估了被城市和农村遗漏的农民工收入。结论是，仅因官方统计系统的住户调查抽样和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就导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13.6%，农村居民纯收

入平均被低估 13.3%，城乡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 31.2%<sup>①</sup>。

## ◇ 1.2 世界性减贫范例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不仅实现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大程度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实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减贫。1978 年，按当时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每人每年 100 元统计，不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 2.5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30.7%。1984 年，扶贫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200 元，贫困人口下降到 1.28 亿，贫困发生率降低到 15.1%。进一步，按照 2010 年的扶贫标准 1274 元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从 2000 年的 9422 万人，减少到 2010 年的 2688 万人，相应地，贫困发生率从 10.2% 下降到 2.8%（图 1—2）。

2011 年中央政府把国家扶贫标准大幅度提高到以 2010 年不变价为基准的 2300 元，比 2009 年提高了 92%。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 2010 年的 2688 万人扩大到了 1.28 亿人。按照国际可比的购买力平价法，这一新的扶贫标准相当于人均每天 1.8 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 2008 年制定的每天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

中国扶贫开发以及在整体上已经提前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扶贫开发所取得的成就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认为，中国的扶贫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中国扶贫开发有许多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中国扶贫领域取得的成就，在亚洲首

---

<sup>①</sup> 高文书、赵文、程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计的影响》，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8—242 页。

屈一指，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为之骄傲。这些国际机构承认，30年来，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归功于中国。这是中国对国际扶贫和发展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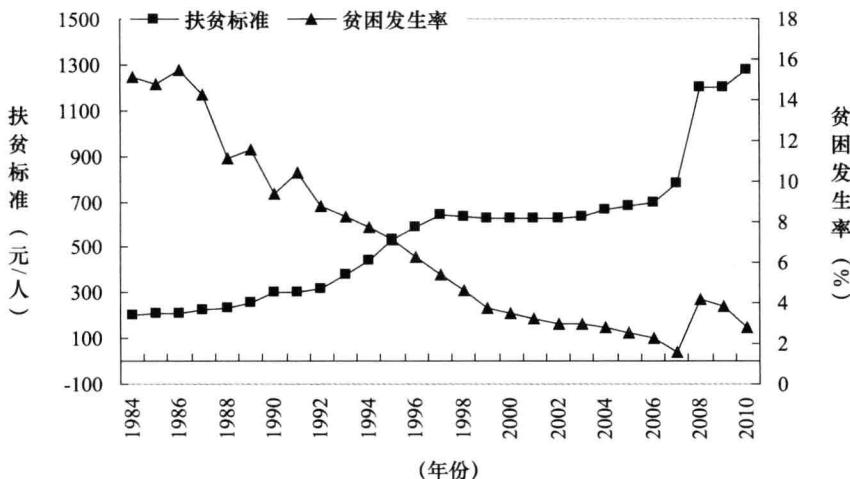


图 1—2 扶贫标准提高的同时贫困发生率下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回顾中国农村多年的发展历程，缓解贫困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对农村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成为这一时期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农村居民整体收入增长，成为这一时期减贫的主要因素。

1978年开始对农业经营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与提高农产品价格、加速农业结构调整以及乡村工业化等一道，全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化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展，不仅增强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也给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拓展就业渠道、实现脱贫致富提供了新的机遇。由于这一轮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制度

创新实现的，且解决了微观个体的激励机制问题，改革所带来的收益也因此迅速传递到贫困人口，使贫困农民得以脱贫致富，农村贫困现象大幅度缓解。

1978—1985 年期间，全国农业增加值增长了 55.4%，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40.3%；农产品综合收购价格指数提高了 66.8%，据估计农民因价格提高增加的收入，占此时期农民新增收入的 15.5%。同期，伴随着各种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2.6 倍，农民人均摄取热量从 1978 年的每人每天 2300 千卡，增加到 1985 年的 2454 千卡。在这一时期，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2.5 亿，下降到 1985 年的 1.25 亿，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 14.8%；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 1786 万人。这无疑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减贫过程。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末的一段时间，可以看作是实施减贫的第二阶段。政府成立了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多渠道安排了专项资金，制定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并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通过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这一阶段扶贫工作可以看作是针对农村特定人群的政府努力，有两个特殊经验。

首先，在确定了区域开发式扶贫的总体思路后，为了集中使用扶贫资金，有效地扶持贫困人口，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标准，确定了一批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国政府于 1986 年第一次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标准：以县为单位，1985 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1150 元的县。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对贫困县的标准也及时作出调整。当时确立了 592 个国定贫困县，占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的将近 1/5。

其次，1993 年国家制订并颁发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个计划力争在 20 世纪的最后 7 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 8000 万贫困